

高晓声一九八〇年小说集

高晓声一九八〇年小说集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·北京

封面设计：于绍文

高晓声一九八〇年小说集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120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6 插页2

1981年8月北京第1版 1981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20,000

书号10019·3179

定价0.47元

船 艄 梦

(代前言)

去年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《七九小说集》，我讲了一个“摆渡”的故事，代前言。今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版我的《一九八〇年小说集》，按理应该再写一篇前言；其实呢，一个人的工作，阶段性是相对的，连续性是绝对的，哪能年年另起炉灶哟！《一九八〇年小说集》的前言，岂不就是《七九小说集》的后语吗！为了避免前言不对后语，我就把那“摆渡”的故事，继续讲一段吧。

且说摆渡这个行当，有忙有闲，有苦有甜；亦易亦难，亦稳亦险；撑船摇橹，也不是一朝一夕就拿得住的。那位自愿改行去摆渡的作家，确实也经过了一番磨炼之后，才把渡船使得听话的。你看那两岸码头，隔江相对，渡船从这边航到那边，要看准风浪大小，流速缓急，潮汐涨落，选择不同路线，才能不偏不倚，停落在对岸码头上。稍不小心，船就顺流漂落，再要逆流摇到码头上去靠岸，那就费劲得很了。有些知识里手，总以为渡船应从这个码头朝对岸的码头一直线航去；一旦发现曲折，便大惊小怪，认定是弄错了，视为异端。好象天下从此就不太平。唉，好在这摆渡的当过作家，这类事也碰得多了，所以见怪不怪，只是好心地笑笑而已。

这摆渡的忙闲，也有规律，上半天渡客很多，下午就少了。所以，作家吃过饭，总带一本书来消闲。近来听有些人说中国的现实主义传统手法不够用了，不免猛吃一惊，觉得自己落后了十万八千里；人家不够用，自己竟还不曾摸着边呢。于是不得不抓紧时间，学点东西。这天饭后，他带来的小说，是连续看了几天的《三国演义》。这自然是从前看过了的；温故而知新，所以还是要看。

他上了船，走到艄头，靠着橹横躺下去，看起书来。这时正当楝树开花季节，暖烘烘的阳光，晒得人软绵绵；刚看到玉泉山上普泉和尚打坐在蒲团上，便感受到了清静安谧的气氛，眼睛一闭，打起盹来。

恍惚间，便听得空中有人大叫“还我头来！”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位无头将军，手提青龙刀，跨下赤兔马，后随一个白脸的，一个黑脸的，分明是关公显灵来了。正想回避，却被普泉和尚拉到身后，让他在蒲团上坐定；然后漫声向空中问道：“来者关云长乎？”

“然也。”

“君侯别来无恙？”

“什么，老和尚你说什么？”关云长觉得受了奚落，立刻生起气来，不再斯文了：“老子的头都被人杀脱了，还讲什么‘痒’不‘痒’！”接着又大声叫道：“头，头，还我的头！”

普泉和尚莞尔一笑，说道：“君侯息怒，老衲尚有一言，不知可容说得？”

“道来！”

“君侯的头，被人砍了，便吵着要还；请问，那被你杀

脱头的许多人，又向谁去索头来？”

作家听到这里，便知道关云长接下去会说什么，那是《三国演义》上写明了的老故事。哪里想到，这关云长竟不曾被普泉点醒，因为脖子上已没得了“葫芦”，还盛得什么药！反而心头火起，舞着大刀，斩云劈雾，一阵乱砍。这自然是失去神经中枢控制的行为，那八十二斤的大刀，一个失手，竟飞了出去，不知下落。关云长哎呀一声叫，身子一侧，翻身落马，便从云眼里掉了下去。

普泉和尚失声叫道：“不好。”连忙伸手去拉，哪里还来得及，早如一缕青烟，化得无影无踪了。

这普泉和关云长已有数世交情；机缘极巧，差不多总是在云长生前或死后碰到。所以每次见面，极不平常。这次普泉有心再点化他一番，谁知话还没有说到正题，竟发生这意外变化。云长坠入凡界，自然又投胎去了；他进了女人的肚皮，和尚也没法拉他回来。只得跺足着急道：“糟糕糟糕，这家伙投胎不带脑袋去，岂非不要脸！”

作家见和尚着急，便安慰道：“莫慌，他不要脸，也没得头脑，未见得有多大作为。”

普泉一拍膝盖说：“你要晓得，他肚里可有一部《春秋》哪！”

作家被一语点醒，叫声：“苦呀，怎么办？”

普泉为难道：“从前他是个红脸，容易认出来；这番下去，变成什么样子，倒不晓得。若能及早寻着他，多加关照，或能走上正道。”

“唉！”作家叹道，“红尘之中，人海茫茫，要找出个不知

姓名的陌生人来，不是大海捞针吗！”

“你莫灰心，我自有道理！”普泉说罢，双目闭瞋。良久，才睁眼微笑道：“善哉善哉，他去投生路上，拾着一个头颅。只是心急慌忙，装到颈项上去时，装反了方向：那面孔是朝着背脊的。你那渡口，也是人生必经之路，务必多加注意，切莫错过过去。”

普泉说罢，便把作家轻轻一推；那作家头上一阵痛，惊醒过来，却是南柯一梦。抚抚额角，竟胀了一个瘤，原来碰在槽边上了。

从此，作家摆渡，多了一个心眼，对过往渡客，总要细细观察，想找出那面孔背向的人来。以便遵照普泉的嘱托，开导开导。

谁知这竟是一件很难的工作，因为一个人穿了衣服，胸和背也不易辨认出来。只要衣领口生在下巴底下，就很容易把背面看成正面。

任务没有完成，作家心中一直不安。他有一个良好的祝愿，希望衣领口生在下巴底下的人，面孔确实是朝前看的。他想起那装反了脑袋的转世关羽，便替他难受，因为一个人怎么能够每天眼睁睁看着自己大便呀！

目 录

我的两位邻居	1
陈奂生上城	17
附：“漏斗户”主	
钱包	45
定风珠	59
山中	69
尸功记	81
鱼钩	87
宁静的早晨	100
极其简单的故事	109
陈家村趣事	155

我的两位邻居

落笔写我的两个邻居，很觉为难；总说远亲不如近邻，一个人和邻居的关系，实在忽视不得。相处得好，是很舒服的，倘若见面就碍眼，那就尴尬了。比如，清早起来，都是差不多时候去上班，往往你刚走出大门，他也正跨过门槛，如果相好，便会微微一笑，一个说“你早”，一个说“你好”，大家快乐，带来整天高兴，工作累些也不觉得，那效果赛过一碗参汤；如果相恶，就糟了，本来是吃完早点，和亲爱的孩子妈贴了贴脸，鼻子上沾满了香味儿，被柔情蜜意陶醉着，满面春风跨出门来的，扑面碰着邻居，蓦地便如在冰天里宿了一夜，一脸霜花，一个向东别头颅，一个朝西扭脖颈，一件件陈账宿怨涌上心头，十亿八千万个细胞都象生错了位置，浑身没一块地方舒服，精神受挫，身体受损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难得一天不是如此，谁能受得了？何况过了今年还有明年呢。

所以，我历来主张，同邻居应该和睦友好。我象汽车驾驶员一样，坚决遵守“宁等三分，不抢一秒”的交通规则，至今从未发生过“撞车”事件。有朝一天，居民委员会想到要评选睦邻模范，我是大有希望的。但是，这次写小说，我异想天开，要把两个邻居写出来，真担心会出点纰漏。从来写小说，总要有褒贬；一褒一贬，会引出一喜一怒，一爱一恨，三家人家，闹出两

派；尽管我笃定是在多数派一边，心里也不受用，万一以后吵出事来，我就有“拉一家，打一家”的嫌疑。倒不如各各表扬一番，落个皆大欢喜。可是这也很难，古来论功行赏，也不曾有几回做得公平，哪能就没有意见了！说了东邻十分好，西邻好到九分半，那半分也能掀起风波。自然，全批满分也可以，不过小说写成那样，便如一九七八年的奖金了。世界上的事情，难煞过多少皇帝，我一个握笔杆的，焉能做到八面玲珑！拍马吗，也不容易，一拍沾上一身屁臭，自己固可以假装闻不见，或者闻惯了不在乎，但在人群里就难混了。有风的时候还好，只有下风头的人闻着了骂，一旦风停，四面八方就都会骂过来，岂不成了过街老鼠！所以此路也是不通的。怎么办呢？我不禁又想起从前的皇帝来，他们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，索性面孔一板，各打五百个屁股，不怕你不伏地谢恩，三呼万岁。这是我能做得的吗？

千难万难，真是写邻居最难，左思右想，还是三十六着，不写为上着。因此，两年多来，一直未敢动笔。

最近，我的东邻方铁正同志不幸病故，哀伤之余，我的心又萌动起来，为了纪念他，忍不住不写了。但这种情绪，必然会使我过誉老方而疏慢西邻的刘长春同志。老刘呀，这可要请你原谅了。人类的感情总倾向于怀念死者的好处，一个人的缺点随着死的到来会被宽恕，一个追悼会上总免不了看到同死者生前相恶的人，由此可知死对人们感情的变化起着多么伟大的作用！而你和我，确实是老方的好朋友，我们同过患难，经常互相帮助，都为友谊建树过功勋。为了他的过世，我们至今还沉浸在悲痛之中，即使我们发生了不愉快，我们也有

充分谅解的基础。这次老方同我们永别，我们已清楚地看到了死神把手伸进我们里边来了，我们不能不想到自己也总有那么一天。如果我今天对你的称赞，比老方逊色，便觉得不乐；那么，我郑重保证，只要我能死在你后头，我一定有机会象称赞老方一样称赞你的。如果倒过来，要劳驾你参加追悼我的会，那也幸甚，象我上面说的那样，你也只会叨念我的好处了。我充分理解我们都能够顾全大局，所以我毫无后顾之忧。

我和我的邻人——东邻的方铁正和西邻的刘长春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身体都搞垮了。那原因无非是挨了些无情棍，受了些窝囊气。现在也不必再多说。“四人帮”粉碎以后，各种冤案、假案、错案，逐步清理，平反昭雪，活着的恢复名誉，重新走上工作岗位；死了的也不亏待，都开追悼会。报纸上不断登载这一类消息，在社会上的反响非常热烈。老百姓受“唯送死，可以当大事”的影响极深，对忠臣的被害，虽然忿忿不平，但现在看到了大出殡，满足于死后的荣耀，心中也就释然了。对于追悼会上，偶然夹杂个对死者实有罪责的人，有时也会引起一番议论，但都宽宏大量，并不学“四人帮”的样子，把他拎出来；认为他既然能在死者灵前同大家一起默哀，也是一种追悔的表现。当然，有人也谈到这可能是装腔，而装腔是牵涉到究竟算“光明正大”还是“阴谋诡计”这个原则的，未免放不下心，或有余气，或有余悸；既而想到一个人终于不得不煞住气焰，装出“腔”来，又何妨看他今后如何把戏演下去，暂不计较

也罢。人民总是乐观的，对前途充满信心，自古以来，坏人从来就有，一旦绝种，生活就显得单调了；鳄鱼、老虎，现在都要重点保护；最杰出的医生，在癌细胞面前束手无策；最平庸的生物学家，却高喊禁止破坏生态自然，你看这世界有多矛盾！坏人能够存在，是因为有坏人可以欺侮；好人能够存在，是因为终于能不让坏人得势。你看，生活不就是这样吗。

我们三个人，都关心这种带有运动势头的追悼会。有时一起闲聊，痛骂一顿“四人帮”之后，便往往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要讲一点心酸的话，开几句苦楚的玩笑。有一次，刘长春长叹一声说：“唉，十年文化大革命，想做的事情不曾能做，现在老罗，好时光错过罗，身体垮成这个样子，你们要替我开追悼会罗！”

我看着他红润的脸色，已经发胖的身体，比三年前年轻了十岁，正在返老还童，心里十分羡慕，嘴里却说：“老刘，我们三人中，论年纪是你最大，按理你应该先死。你的儿女都成人了，自己也当过几年（区房管所）主任，虽然文化大革命中丢了官，倒证明你同林彪、‘四人帮’没瓜葛，落得一身清白。无论从哪方面说，都不算虚度一生，人固难免一死，你我谁能破例，细想起来，的确还是你先死为顺。”

我说罢，自己先笑。方铁正睁大着近视眼，在镜片后盯着我，那苍白清瘦的脸，正儿八经，先张开嘴巴“哧”的一笑，然后又骂我说：“扯淡。”便抿紧了尖瘦的嘴，不再理睬。老刘听罢，皱起眉头，半闭着眼睛瞅住我，半恼半笑地说：“你看你，我说死，你就巴我第一个，尽念咒语，再没一句好话。”说罢，抚了抚脸，挺了挺胸，还做了个扩胸的动作，好象听到了晦气话，要

为自己壮胆似的。

我笑得更甜了，连忙分辩说：“哪里哪里，原是你自己不好，要我们参加你的追悼会，你不先死，这会我能有份吗？我倒希望走在你们两位前头，免得为老朋友伤心掉泪。”

于是，老刘也跟着我笑了。但这笑，就象敲错了琴键一样，随即戛然止住。因为我们都看到老方没有笑，他噘着嘴，一脸不屑的神气，分明在骂我们言不由衷。因为他明明知道我们最担心的是他的身体，他是最可能走在我们前头的。他看出我们故意回避不说，就生气了。好象我们要瞒着他把状元抢走似的。

这无声的责备，逼得我和老刘互相使了个眼色，一时沉默了，后悔不该开这种霉气的玩笑。起初，我们倒并非有意，后来确实是存心不说他的。现在被他看穿，真觉得亏待了他，有点过意不去；好象只有赞成他第一个升天，才对得起他似的。

要在这种窘境中解脱出来，我是个低能儿，我竟说：“好，好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”这分明是废话，本来就已经不再说了嘛！这更是蠢话，难道“不说”还要发表声明吗！

老刘毕竟当过主任，会做思想工作，他倒似乎认为我的话揭开了盖子，便抓住战机，直截了当摊牌了。他板着脸，又正经、又严肃地说：“老方，你确实应该当心，你看你的身体，一天天坏下去，叫你吃药不吃，叫你休息不休息，叫你锻炼不锻炼，一天到夜还在狗一样叫，猫一样跳，你究竟还想不想活下去？这话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你不听，你要做顽固派；再不改，你的命就要顽固掉了，有好处吗，唔？”

这些话，听来狠得过分了，但却明显地是为了一个同志的

生命担忧，狠得越过分，就是越关心的表示。我自愧不如，我不能这样做；我也很感动，我承认老刘对老方的感情确实胜我一筹。于是我连忙说：“是啊，老方，大家都很关心你啊（我不敢说‘我很关心你’，真惭愧），你的身体，是要赶快修理修理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只要活着，还怕没有事情干吗！何必急得那样子，象来不及了似的，白天忙了不算，还磨夜呢。”说到这里，老方好象不耐烦了，简单明白地插话道：“我睡不着。”

我不甘心地说：“睡不着，就吃点安眠药，总不能任它去，一个人有多少精神呢……”我还想说下去，忽然被老方睁大的眼睛盯得有点吃不消，好象他在责问我：“你刚才声明‘不说了’，还噜苏什么？”我连忙闭上了嘴。

这时候，老方才把眼睛望着别处，毫无表情地说：“我只想再活五年。”

“五年？”老刘大声说，甚至站了起来：“你这个聪明人，给什么迷住了心窍？你今年几岁了？四十六，比我小八岁，难道连我这点年纪都不想活？孩子还小，老婆还年轻，你能死了吗？”老刘说着，忽然愤怒起来：“‘四人帮’要整死我们，我们都挺过来了，那时候，我们就是不死，要活着看到他们垮台，这不是，他们垮了。告诉你一件真人真事，省委书记老周被关起来的时候，‘四人帮’想害死他，又不敢下手，他们一面装腔做势，告诫他不许自杀，一面却在关押他的房里放了绳子、小刀、安眠药、敌敌畏……诱他上钩。可老周哪，就不上当。你想想，你还能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老刘忽然象想起一件大事似的，连忙看了看表，说：“总是为了你，又过了五分钟了。”说罢转身就

走，还连连回头说：“你想想，你舍得，我还舍不得你呢。”

我也看了看表，二十一点过五分，唔，不错，老刘上床的时间是二十一点，真超过五分了，这是难得的。三、四年来，老刘定了个作息时间表，执行得极严格，他的身体明显地健康起来。唉，假使老方也能象他那样，何至于叫人担忧呢！

老刘走了，我又不敢再讲话，沉默了片刻，老方站了起来，一面走，一面咕嘈道：“我只想活五年。”

他一点也没有听我们的劝告。

二

我想着这两位邻居，当天夜里竟失眠了。

这两个人，都是犟脾气，从来不听劝。各人还自以为是，要求对方听话，真是怪极了。更奇怪的是，他们不但不抱成见，反而很合得来似的，一向互相关心，互相照顾。为了老方的健康，老刘一再劝他象自己一样，有计划地进行持久的体育锻炼，要他早晨起来跑步，下午打太极拳，晚上做气功，并且把买来的有关资料送给老方。老方不听。老刘不灰心，有一次请便人从吉林买到一斤人参，他按原价让半斤给老方，老方不要，他就送了两支。到下一年过了梅雨天，竟发现都霉烂掉了。他把老方狠狠地骂了一顿，声明从此不管他了。可是，有一次老方病重，一时住不进医院，他却千方百计走后门让他住进去，而老方却待不住，治疗得稍有好转就出院。老方呢，一贯主张老刘在落实了政策以后应该去上班，老刘至今不去，他说：“这算落实的什么政策，我本来是第一把手，被‘四人帮’坑

害了这些年，反倒叫我去当第二把手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”老方就说：“第一也好，第二也好，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吗？”老刘大笑道：“你们知识分子就是呆，也难怪，没有当过头头，不懂。第一和第二，相差十万八千里呢。”老方不赞成说：“你是受过‘四人帮’害的人，竟也会沾上‘权迷’的习气。”老刘不满道：“不是我去夺人家的权，是我的权被别人夺了，不还给我，我就不上班，我是受害者，现在降职使用，倒象是犯了错误，这不是颠倒了吗！”老方也不满说：“就算你有理，人民总没有亏待你，不做事，白吃人民的，总说不过去。”老刘一挥手说：“算了，你是个迂夫子，同人民的账，也不是一天两天结算的，死下来总算吧。我身体不好，现在就锻炼锻炼，这不是为了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吗。”讲来讲去，就是这样。老刘不但不去上班，反过来倒要老方代他起草递给组织上的报告，老方也居然会答应，两个人常在一起，细谈情况，斟字酌句，花掉不少时间。这种报告前后打过几次，老方白天没有空，都是熬夜写出来的。更动人的是老刘的儿子，功课本来极差，七七年高考低于分数线很多，后来跟着老方补习，七八年竟考取了大学。现在，老刘的女儿，又几乎每天晚上都拿了课本上老方家去，老方也从不厌烦。我在旁边看了，着实感动，又觉得老方耗费的精力太多，实在有点替老刘说不过去；也难怪老刘会对老方如此情重。说到根上，总是既然住在一起，不会没有这些往来，也说不上谁沾了光，谁吃了亏，反正是为大家好，都值得称赞。

但是，老刘毕竟是很会照顾自己的人，不仅用不着我担心，倒是更值得我羡慕。我的身体，本来比他强，由于他坚持体育锻炼，我竟不如他了。确实，我们是很聪明的，终于找到了

延年益寿的最好办法。参加体育锻炼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在我家门前的广场上，每天从清晨三四点钟开始，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跑步声。青年人最有雄心壮志，他们岂止为了健康，还力争当出色的运动员；中年人就不同了，无非是为了加强抵抗力，保住朝气而已；至于老年人，生活在这样美好的时代，实在不忍离去，也参加了这个行列，因为即使做不动什么，活动活动筋骨也是好的。我深深被这种精神所吸引，所感动，觉得个人的身体也是革命的本钱，实在无权玩忽，也常想参加到锻炼的队伍里去；有时候真的做了，但总是一天捉鱼，十天晒网，坚持不下去，而且起得过早，锻炼得过分一点，反而早饭以后想睡觉，上班也差劲，人家笑我炼的不得法，而我则模模糊糊地想到锻炼也要具备条件，我一天到晚很忙，体力消耗得多，本来就累了，再锻炼岂不更累。但又怕别人误会这理由是自己意志薄弱辩护，自然不说出来。

可是，老方是脑力劳动者，意志又坚强，身体这样差，为什么不肯听老刘的话呢，锻炼锻炼，对健康应该有好处啊！他是我们之中最年轻最有作为的一个，如果这样下去，岂不糟糕！想起来，老方的经历，也真叫人感叹，他四九年就参加党的地下组织，解放后就在党委部门工作；五七年反右后，就调到中学里去教语文。他是个脚踏实地、埋头苦干的人，工作干得很出色，但从未受过表扬，他也从不计较。文化大革命开始后，红卫兵翻他的档案材料，才查出五七年调来中学的原因在于思想严重右倾，有同情右派的言论。这样重大的政治结论，他竟象被蒙在鼓里。这时候别有用心的人，就抓住这一点，说他是内定右派。他当然不承认。他性格本来就犟，竟硬顶起来，